

执行主编 孟广林 赵秀荣

新世界史

New World History

〔第三辑〕

新视野下的英国文明史研究

钱乘旦：评布莱尔执政

高岱：1215年《大宪章》第33条的存废与泰晤士河三文鱼的消失

孟广林：悲情与愿景的双重变奏——从政治“文学”看中世纪英国贵族的权益诉求与话语表达

〔英〕安德鲁·韦尔（赵秀荣译）：近代早期英国社会对健康与环境关系的认知

陈晓律：评《英国人：国家的形成，1707-1837年》

刘景华 范英军：中国学者对英国史的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新世界史

〔 第三辑 〕

执行主编 孟广林 赵秀荣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世界史. 第三辑, 新视野下的英国文明史研究 / 孟广林, 赵秀荣执行主编.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8

ISBN 978-7-5201-4970-9

I. ①新… II. ①孟… ②赵… III. ①世界史-研究
②文化史-研究-英国 IV. ①K107②K561.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110660 号

新世界史(第三辑): 新视野下的英国文明史研究

执行主编 / 孟广林 赵秀荣

出版人 / 谢寿光

责任编辑 / 叶 娟

文稿编辑 / 肖世伟

出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国别区域分社(010)59367078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3

印装 / 三河市龙林印务有限公司

规格 /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23.5 字数: 369 千字

版次 / 2019 年 8 月第 1 版 201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 ISBN 978-7-5201-4970-9

定价 / 9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成果受到中国人民大学 2018 年

“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支持

《新世界史》编辑委员会

(按音序排列)

杜宣莹 郭小凌 何黎萍
侯 深 侯树栋 黄春高 金永丽
刘北成 孟广林 钱乘旦 宋云伟
〔美〕唐纳德·沃斯特 (Donald Worster)
王大庆 王皖强 王文婧 徐 浩
徐晓旭 许海云 晏绍祥 赵秀荣
周施廷 朱孝远

本辑执行主编

孟广林 赵秀荣

责 任 编 辑

赵秀荣 周金波 温灏雷

编者的话

经过一段时间的组稿、编辑与校订,《新世界史》第三辑终于杀青付梓。本辑的《新世界史》集中展示了近年来我国英国史研究的学术成果。

由中国英国史研究会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承办的“中国英国史研究会 2017 年学术年会”成功举办,百余位参会者围绕“新视野下的英国文明史研究”这一主题,对自古至今各个时期英国文明史诸重大问题展开多层次、多角度的热烈研讨。会后,我们遴选会议论文,编订了《新世界史》第三辑。

本辑论文的作者,既有我国史学界的学术名家,也有成就突出的中年学者,更有一批崭露头角的青年学人,显示了我国的英国史研究血脉绵延、薪火相传的可喜局面。同时,本辑收录的论文不仅包纳政治史、经济史、宗教史、思想文化史等传统史学领域,也涵盖了环境史、社会史、语言史、情感史等新史学领域。此外,不少论文或提出值得关注的新问题,或阐发很有见解的新观点,折射出我国的英国史研究不断升华、“百花齐放”的景象。

在我国世界史学科中,英国史一直是学科建构完备、学术队伍整齐、研究成果丰厚、国际化程度较高的重要分支学科。这是因为在西方近现代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思想的建构中,在西方乃至整个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英国曾经是长期引领潮流的先行者与开拓者,其丰富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一个颇有价值的“历史样本”。正因为如此,我国史学界十分注重对英国史的研究,并在改革开放后取得长足进步,而中国英国史研究会也成为我国世界史学界最有学术感召力与影响力的研究团体之一。我们相信,我国的英国史研究将在以往的基础上继续开拓创新,不断提升学术水平,为我国世界史研究的发展做出更大的学术贡献。

《新世界史》的出版，既得到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领导以及世界史学科诸同仁的竭诚支持，也得到参会专家学者的热烈响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也为本集刊的出版付出大量辛劳。对此，我们谨在此一并致以深切谢忱！当然，本辑所出现的不足及问题，理应由我们负责，恳祈史学界以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2019 年 6 月于中国人民大学

· 专题研究 ·

评布莱尔执政	钱乘旦 / 3
1215 年《大宪章》第 33 条的存废与泰晤士河三文鱼的消失	高 岱 / 19
保守主义在英国政治运作中的制衡作用	朱孝远 / 28
悲情与愿景的双重变奏	
——从政治“文学”看中世纪英国贵族的权益诉求与话语表达	孟广林 / 44
从关注“一条鱼”谈环境史的创新	梅雪芹 / 66
一种乡村自然的愿景？	
——近代英美的城市公园	张卫良 / 79
皮科克与瓦拉：比较视野下近代英国历史文献学的发端	张乃和 / 91
伊丽莎白一世的财政状况	施 诚 / 101
从英国脱欧看当前英国“反智现象”	许海云 / 111
保留政策与印度农村基层女性参政	金永丽 / 125
19 世纪后期澳洲社会中的“离心”与“向心”现象	
——兼议 1887 年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登基 50 周年庆典与 1888 年 澳洲百年庆典	王宇博 / 138

神话的源起、传承与破灭：亨利七世遗产的历史考察	张殿清 / 157
保持神秘，抑或公开宣传？ ——17 世纪 30 年代英王查理一世君主形象策略及其成败研究	刘淑青 / 167
黑死病与欧洲社会转型研究的重新审视	赵文君 / 179
英语作为全球通用语的优势与危机	苏前辉 / 197
论工业革命前后英国消费社会的兴起与现代社会转型	曹瑞臣 / 213
撒切尔时期社区费政策的形成过程及其问题	黄小东 / 226
近代英国海外布道会研究综述 ——以伦敦布道会为中心	傅 政 / 240
想象天主教徒：英格兰伊丽莎白时期新教民族认同的构建	孙 超 / 251
浅析 17 世纪末英国皇家非洲公司在西非沿海的活动 ——以 1683 年塞康第商栈公务信件为视角	张 歌 / 262
安茹时期英格兰国王特权城市的民主及其限度问题	陶 芳 / 285
· 文献和论著选译 ·	
近代早期英国社会对健康与环境关系的认知	〔英〕安德鲁·韦尔（Andrew Wear） 赵秀荣译 / 297
· 学术动态 ·	
评《英国人：国家的形成，1707—1837 年》	陈晓律 / 319
中国学者对英国史的研究	刘景华 范英军 / 329
时代语境的嬗变与话语权的凸显 ——钱乘旦教授主编的《英国通史》评介	邹 博 / 349
中国英国史研究会 2017 年年会学术综述	赵秀荣 周金波 / 358
《新世界史》征稿启事	/ 368

专题研究

Monographic Study

New World History

贵州师范学院内部使用

评布莱尔执政

钱乘旦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1997年5月1日，在时隔5年之后，英国举行大选。英国工党在选举中大获全胜，取得419席的绝对优势，几乎占议席总数的2/3。这是工党自建党以来取得的最大胜利；即将步入44岁的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出任首相，成为自1812年利物浦勋爵（Lord Liverpool）执政以来最年轻的一位英国首相。^①此时，保守党已经历了辉煌的“撒切尔时代”，加上梅杰（John Major）的7年执政，工党已经有18年不在台上；如果工党再不执政，它的政治生命岌岌可危。这一年的大选终于扭转了工党的颓势，“布莱尔时代”开始了。在布莱尔执政的十年中，英国走了什么路、执行了什么政策？如何评价布莱尔执政？这是本文试图解答的问题。

一 时代背景

1979年，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Hilda Thatcher）出任首相，开始了延续18年的保守党执政。撒切尔一反二战以后英国两党的“共识政治”，背离凯恩斯主义和高福利、国有化的政策，下“猛药”治理“英国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英国经济开始复苏，“滞胀”怪圈渐渐消退，通货膨胀率从1980年的18%下降到1983—1987年的平均每年5%以下，以后尽管又有回升，但创造了60年代末以后最好的纪录。1979—1989年，英国的人均生产增长率超过美国 and 德国，在七国集团（G7）中位列第三；全

^① Mick Temple, *Blair*, London: Haus Publishing, 2006, p. 44.

员生产率超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平均水平，仅次于日本和法国。英国与欧洲主要竞争对手德国之间的距离大大缩小了，1977年，德国制造业的生产率比英国高49%，到1989年只比英国高15%。1988—1989年，英国经济年增长率达到创纪录的5%，在发达国家中名列前茅。尽管失业人口从1979年的100万人增加到1986年的300万人，但就业人口则从1979年的2250万人增加到1989年的2690万人。更多的英国人比10年前更富裕了，其十年增长率在英国历史上首屈一指。^①

但代价也是巨大的。撒切尔的政策是“劫贫济富”。按照“新自由主义”的理念指导，贫富差距扩大了，社会更加不公正，1979年，收入为全国平均水平一半的阶层承担国家税收的13.9%，1987年这一比例上升到16.1%；而5倍于平均水平的阶层承担的纳税比例则从51.5%下降到43.1%，1992年更是下降到35%。^② 国民福利事业受到影响，撒切尔政府力图减少社会福利开支，对养老金、家庭补贴、产假补助、失业救助等做出严格的限制，并对医疗保险制度进行改革，看病就医不再由政府全包，教育经费减少了，科研费用被削减，工会受到沉重打击。1989年，经济再次出现负增长，“撒切尔主义”似乎失效。这时，工党本有机会重新执政的，但保守党却继续稳坐权力宝座，梅杰，这位被认为是英国历史上最没有作为的首相之一，居然可以在撒切尔辞职后安安稳稳地执政7年，并且在1992年大选中，领导保守党以336席对271席的绝对优势再次获胜，以致工党领导层哀叹说：保守党“猎走了我们的狐狸”。^③

工党连续四次大选失败，原因是提不出明确的政治路线，以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为两大基础的“共识政治”明显被撒切尔破坏了，工党应该怎么办？为此，工党内部陷入严重的路线分歧，而分歧的焦点是：工党应该维持“工人党”的面貌、坚持“社会主义”路线，还是做一个“全民党”、像保守党那样争取有产者的支持？工党在建党初期是一个“工人党”，党员

① Leslie Hannah, "Crisis and Turnaround? 1973–1993", in Paul Johnson, ed., *Twentieth-Century Britain*,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1994, pp. 343–346.

② K. Hoggwood, *Trends of Public Policy in Britain*, London: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97, 105.

③ Kenneth O. Morgan, *The People's Peace, British History 1945–199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506.

中除极少数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如费边社）之外，全都是工会会员；党的领导阶层几乎全是工人出身，党对自己的工人身份感到自豪。1918年，在费边社的帮助下工党制定出一部党纲，其中第四条提出“生产、分配和交换手段公有制”的纲领，从而明确了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党”。但“社会主义党”和“工人党”的身份使它在1924年和1929—1931年两次早期执政时的处境十分尴尬，因为作为一个在议会体制下的执政党，它既不能为工人阶级单独掌权，又不能不为工人阶级掌权，结果就只好无所事事、一无所为，并最终导致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的“叛党”事件。^①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这种尴尬局面，在战后英国国民要求改变现状的强大民意支撑下，第三次执政的工党艾德礼政府实行“国有化”，并建立福利制度，工党的“社会主义”与全民拥戴的福利国家似乎能调和起来，于是“工人党”和“全民党”居然能有效地融为一体，工党的支持率达到了顶峰。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了第一次“共识政治”，保守党向工党靠拢，接受了工党的基本路线，此后一直到70年代末，两党都执行大致相同的政治和经济政策。

但是，工党却逐渐失去社会基础，这是很可怕的。在“福利国家”框架下，“有产”和“无产”之间的对立似乎在消失，许多体力劳动者上升为“白领”，而脑力劳动和管理者阶层也受雇于人，像工人那样拿工资，尽管他们的收入远远高于普通工人。社会下层的经济和社会地位都在提高，高等教育普及到劳工，为其子女进入“中等阶级”提供了可能性。一个多层次、多元性的社会正在形成，在这个社会中，“工人阶级”的定义开始变得模糊，真正从事社会低下工作的有许多是外籍移民、边缘人群或者妇女，但这些人的特殊身份也许更适合用“种族”或“性别”来界定，他们不是传统的“工人阶级”。人们属于哪一个阶级，似乎越来越与经济因素无关，而与他们的自我认同相关。据历史学家史蒂文森（John Stevenson）提供的数字，在20世纪初，工人阶级占人口的75%，上层和中层合在一起占

^① 1931年因无法应对严重的经济危机，工党首相麦克唐纳辞职，但随即又与保守党等反对派组建“国民政府”，继续担任首相。麦氏此举并未征得工党其他领导人的同意，因此被斥为“叛党”并被开除党籍。

25%；^①另一位历史学家阿瑟·马威克（Arthur Marwick）提供的数字则显示：到80年代，大约58%的人属于工人阶级，39%的人属于中等阶级，3%的人属于上等阶级。^②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总体趋势是：工人阶级不断萎缩，中等阶级日趋壮大，最富裕的上流社会也在增长。这对工党是致命的威胁：工党如果继续做“工人党”，并且指望通过竞选来获取政权，它就会找不到自己的社会基础；进而，在选举中，并不是所有的工人都会投工党的票，而保守党却可以因为它“全民党”的外貌在社会各阶层中找到自己的投票人。对工党来说，这就是它在一次又一次大选中接连失败的根本原因。

这样，工党就面临着艰难的选择：是继续做“工人党”，还是转变成“全民党”？工党内部的路线斗争主要就集中在这个问题上。

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党内右翼就提出要修改党章。1959年，时任工党领袖的盖茨克尔（Hugh Gaitskell）对党章第四条（即“社会主义”条款）发起攻击，并要求对社会主义、国有化等问题进行重新认识。盖茨克尔的提议被党内左派和工会代表多数否决，但党的性质第一次遭遇挑战。事实上，此时的工党至少从领导集团看已经很难说是“工人党”了，其阶级成分和受教育程度都越来越接近保守党。根据1959年的民意测验，有38%的人认为工党和保守党没有区别，而在1950年这个数字只有20%。同时，工党的“社会主义”也名存实亡，“国有化”到50年代末就基本停止了；“福利国家”建立后英国向哪里走？工党也说不出所以然。保守党则继承工党的路线，形成了两党的“共识政治”，因此从政治纲领看，工党也不占优势。

面对这些问题，工党左右两派一直在争斗。威尔逊（Harold Wilson）组阁期间（1964—1970，1974—1976），慑于党内左派力量强大，停止了关于党的性质的辩论。他站在中派立场上执行温和政策，维持“共识政治”，不再推进“国有化”，同时也不触动福利制度。但此时“福利国家”的负面影响却在扩大，“英国病”愈演愈烈，面对日益严重的滞胀现象，威尔逊和继

^① John Stevenson, *British Society 1914–1945*,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0, p. 37.

^② Arthur Marwick, *British Society since 1945*,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0, pp. 329, 36–37.

任的卡拉汉（James Callaghan）都无法解决，保守党的希思（Edward Heath）政府也以失败告终。这种情况最终导致“撒切尔革命”，用“猛药”来治理“英国病”，并取得显著成功。

撒切尔的成功反而刺激了工党左派。1981年工党选举新领袖时左派富特（Michael Foot）出线，他随即改变了由议会党团选举工党领袖的做法，改由工会、地方选区组织和议会党团共同选举领袖，而且给工会最大的权重（40%），这就意味着他加强了工党的“工人党”色彩，削弱了党领袖的影响力。事态发展促使右派脱离工党，另组社会民主党。^①左派高潮在1983年议会大选时工党的竞选纲领《英国的新希望》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其中不仅强调工党的“社会主义”色彩，而且提出大幅度扩大公共开支（因此也意味着大幅度提高税收），加快国有化步伐，以及退出欧共体、实行单方面裁军等。这次大选正值撒切尔主义风头正盛、撒切尔的“猛药”正在见效，因此这个纲领大大地帮了工党的倒忙，许多人说它是“历史上最长的自杀备忘录”。^②保守党在大选中大获全胜，在总共650个议席中拿下397席，工党只得到209席，只有保守党的一半多。^③

大选惨败使工党领导层大为震动，这以后，一个所谓的“工党现代化”运动在党内展开了。新任党领袖金诺克（Neil Kinnock）虽然出自左派，却认识到变革的迫切性，他在理论上开始承认市场的积极意义，主张在国家指导下发挥市场作用；在实践上他悄悄取消了党章第四条，印发了一批不包含第四条内容的党证。但此举遭左派强烈谴责，他只好收回了这批党证。1992年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继任党领袖，开始加快“现代化”进程。他明确表示，工党只有在放弃公有制纲领后才有可能重新执政，他认为工党应抛弃“非此即彼”即不是“国有”便是“私有”的两极化思维模式，寻找一个中间的解决办法。史密斯路线显然为后来的布莱尔开拓了方向，他的“中间解决办法”，其实是布莱尔“第三条道路”的前身。

① 社会民主党后来和自由党合并，形成现在的自由民主党。

② Hilary Wainwright, *Labour: A Tale of Two Parties*, London: Hogarth, 1987, p. 61.

③ David and Gareth Butler, *Twentieth Century British Political Facts 1900 - 2000*, London: Macmillan Press, eighth edition, 2000, p. 238.

二 “第三条道路”和“新工党”

1994 年上半年史密斯因心脏病突发猝然去世，作为工党“现代派”主将之一的布莱尔被推上领袖地位。当时布莱尔只有 41 岁，是工党历史上最年轻的领袖。他继任后，立即打出“新工党、新英国”的旗帜，着手对工党进行根本的改造。他认为工党面临的任务是完全抛弃“阶级党”的定位，把工党转变成“全民党”。为此，他认为必须尽快放弃“公有制”纲领，把“第四条”从党纲中彻底清除。他说：“我们衰落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不接地气，社会变了，我们却没有变；我们的结构已经过时。”^①于是，上任不久他就在 10 月召开的工党年会上提出废除“第四条”，虽说这次动议没有成功，但半年后党的特别代表大会同意修改党章，把原本“第四条”中“在生产、分配和交换手段公有制的基础上，保障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者辛勤劳动的充分成果，以及这些成果尽可能地平等分配”，修改成“（工党致力于）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体，为公众利益服务，其中市场进取精神和竞争活力与伙伴和合作力量相结合，生产国家所需要的财富……”^②

尽管新党章仍然称工党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a democratic socialist party），但公有制没有了，“社会主义”变成了“合作”。由此，工党被抽掉了党的性质的灵魂，一个“新工党”出现了，它与保守党还有区别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布莱尔捡起了“第三条道路”，为“新工党”提供意识形态基础。

什么是“第三条道路”？在它刚刚问世的时候曾引起全世界广泛的好奇：它意味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道路吗？或者是公有制和私有制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对此，“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创始人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曾说：“第一条道路是建立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基础上的传统社会主义思想，凯恩斯本人不是社会主义者，但他的思想在西方却被应用于社会主义的实践”“第二条道路建立在市场哲学的基础上，以英国为例，在撒切尔夫人看来，竞争性市场是经济繁荣的动力……”而第三条道路

① Malcolm Pearce and Geoffrey Stewart, *British Political History, 1867–2001*, third ed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 568.

② Malcolm Pearce and Geoffrey Stewart, *British Political History, 1867–2001*, p. 569.